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下街友的處境與對策： 以社會正義觀點探討

顏睦蓉、趙祥和

## 壹、前言

自2019年末爆發的新冠肺炎 (COVID-19)，衝擊與改變人類生活樣貌，造成全球陷入經濟、社會、健康等等多方面的恐慌。股市大崩盤、學校進行遠距教學、搶口罩之亂等等因疫情導致的問題接踵而來。而2021年5月原本稍微被控制住的疫情，又再次在臺灣爆發，短短幾個禮拜之內，迅速升溫到達了三級，整個街道上空無一人、各大餐飲業也關門歇業、企業開始使用遠距辦公等形式居家工作，政府也因應防疫而訂定了許多法規來保障國民的權益。然而，這些規範對於每個人都是友善的嗎？還是在無形中增加了弱勢者的困境？除了日常活動空間的限制外，原先可以使用的社會資源與服務是否也跟著疫情一同停擺 (Finnigan, 2021)？尤其是長期露宿於街頭的遊民，在面對這一

波疫情時，除了要承受暴露在染疫風險下的危機、因疫情而損失的經濟收入，甚至還要面對大眾的不理解而造成的污名化或是負面標籤 (Barbu et al., 2021; Finnigan, 2021; Ligety, 2021; Tobolowsky et al., 2020; Westbrook & Robinson, 2021)。

傳統諮商模式著重於個案自身及其內心世界，而忽略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 (Ratts, 2009)，造成部分個案陷入環境的問題。而近年來興起社會正義為導向的諮商，透過更宏觀看待問題及更有效能的與個案合作，從生態系統理論中的小系統、中間系統以及大系統等層面協助案主從系統中找到新的解決方案。透過消除族群間的不平等、了解社會脈絡或是文化對於個案的壓迫、倡議、外展、賦權等等行動的方式幫助個案發聲，促進社會環境的意識提升，最後找到個案的優勢並且賦能給他，使其能朝著社會變革邁進

(Goodman, 2004)。而街友屬於結構上的弱勢群體 (Schanzer, 2007)，再加上疫情的侵襲加劇了他們的困境，如何透過社會正義的方式去幫助這些街友是我們值得去反思理解的。

最後，陳燕禎 (2011) 也提到社區的遊民問題如果能妥善處理運作，不但能減少社會上的不公義，還可進一步促進社會資本的能量，產生社區「良性循環」(virtuous circle) 的社會現象。因此，本文擬蒐集國內外街友服務相關文獻，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將描述街友在疫情下所面臨的不公義及壓迫，透過社會正義為出發點的諮商架構與方案模式，作為臺灣當前針對街友提供服務協助的參考模式。

## 貳、社會正義諮商

社會正義旨在創造一個不論是資源以及機會都能夠均等分配的環境 (Goodman, 2013)。社會正義議題一開始與環境破壞與污染、戰爭、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主題相關，而到了1900後漸漸發展成熟，也運用在不同的議題與族群 (葉寶玲, 2016)。社會正義的興起是因為發現只有透過一對一的個案服務的方式無法改變環境因素，個案的問題與生活中的壓迫環境源仍是相連結的。因此，諮商輔導人員應該拓展專業的角色，當壓迫事實發生時，專業人員應該為個案倡議，擔任

社會與政治改變的媒介 (Ratts, 2009; Ratts et al., 2007)。Crethar與Winterowd (2012) 提出「諮商中的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圖1) 希望透過促進社會中的平等，力求每個人都能擁有相同機會、獲取相同的資源以及擁有同等的權利，來呼應諮商中的社會正義 (莊瑞君, 2021)。

社會正義諮商是針對諮商與心理治療中所出現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貧窮等議題，除了理解個案的過去與現在所面臨到的困境外，更致力於改變外在的環境，主張諮商師有道德責任去找出社會文化對案主的負面影響，並且協助個案與社區的連結 (葉寶玲, 2016)。Crethar與Winterowd (2012) 提出社會正義的四大元素：公平、途徑、參與與和諧。公平是將資源、權利和責任公平分配給社會所有的人。途徑是指個案及其家庭系統內的人獲得促進發展的服務、資源、資訊、權力和知識的能力。參與指的是社會上所有人都有權就影響其生活的決定進行諮詢並作出貢獻。和諧是社會平衡的原則，個人的需求最終會產生結果，為整個社會創造盡可能好的結果，同時社會行動考慮到個人和少數群體的需求。

## 參、街友的現況、困境與挑戰

### 一、街友的定義

針對街友的定義，不同學者提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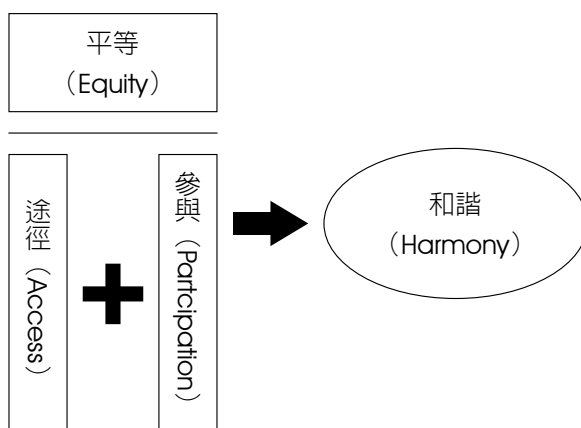


圖 1 諮商中的社會正義

資料來源：Crethar & Winterowd (2012, p.4)。

同的看法。Omerov等人(2020)提及無家可歸者，是無固定住所，有可能睡在大街、待在收容所、單人空間、廢棄的大樓或是車子裡，和面臨其他任何不穩定或非永久性情況的人。隨著時代的變遷、各地不同的風俗民情、或是政策的制定，對於街友的定義也有所差異。廣泛地來說，歐洲議會(European Union)與FEANTSA(與無家可歸者合作的歐洲組織聯合會)將街友的居住型態又分為「露宿」、「無家」、「不穩定的住宿」及「不良的居住環境」四個向度，而後又更精細的訂定了13種針對無家者的操作型定義。聯合國則是排除了不良居住這項分類，將街友分為兩種類型：(一)沒有住處者，包括生活在街道上或是沒有庇護的場所；(二)沒有穩定住處者，包括常在不同的住所之間移動或是在安置中心及收容所的人。最

後，聚焦於臺灣則是將街友的定義更加的限縮，指稱在街頭露宿的人。

關於街友的稱呼，近年來許多非營利組織提倡去除遊民的汙名化，鼓勵大眾以平等、接納的角度去看待在街頭上生活的人們，因此提出以「街頭上的朋友」來為表示親善、平等的對待關係。而在2016年，長期服務街友議題的芒草心協會更提出以「無家者」一詞，從英文直譯過來、較為中性的解釋，以客觀的標示這群人無家狀態(黃克先、鄭麗珍，2018)。

本文為了強調在街頭流離失所的狀態，因此以「街友」一詞概括。

## 二、臺灣街友現況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遊民處理情形調查資料顯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臺灣的街友人口數在2016年為

表 1

作者（年代）	文章篇名	研究情境	研究結果
Crethar et al. (2008)	In search of common threads: Linking multicultural, feminist,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paradigms	找出多元文化、女權主義、社會正義三者間脈絡的異同	提出社會正義諮商的元素與架構：平等、途徑、參與、和諧
Rubenstein and Decamp (2020)	Revisiting restrictions of rights after COVID-19	針對疫情下做出的防疫措施進行健康與人權上的探討	1. 法規的制定應該是保障所有人而非犧牲弱勢的權益 2. 提倡疫情下應該人人皆能平等的獲取資源
Peattie (2021)	Reframing narratives of homeless individuals: The roles of basic dignity and safeguarding in reconstructing perception	以案例研究／敘事分析的方式探討聖地亞哥街友對於服務的可近性與滿意度，並針對問題進行重構	街友無法參與與自身相關的政策與福祉，造成服務無法貼近需求，街友無法感知掌握感
Harrison (2020)	An exploration of male offenders' experiences of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l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ompany'	以社會正義的角度探討諮商師是如何探討犯罪男性	1. 男性犯罪者因為過去的經驗被學校、社會所拒絕。因此無法同等的獲取相關諮商資源 2. 專業人員應了解個案的需求，使其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服務
徐敏雄（2018）	正義與他者之包容：兼談族群平等的倫理意涵	反思與批判甚麼是平等，並探討平等如何影響制度與規範的建立	1. 平等並非單一、機械式的平等，而是強調濟弱扶傾的實質平等 2. 平等意味著國家應以合理的差別待遇積極介入共同體之生活，以落實所謂的正當關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2 我國遊民處理情形和人次統計

年別	受理或查報遊民人數 (人次)	處理遊民情形 (人次) Vagrant Handling Cases									
		合計	協助返家	關懷服務	年節活動	協助就業	收容情形	轉介服務	租屋媒合	因故死亡	其他
2016	2,556	339,449	289	308,612	11,086	2,832	2,962	5,940	341	118	7,269
2017	2,585	395,094	278	359,910	10,773	3,287	3,478	8,674	262	143	8,289
2018	2,603	382,982	351	349,965	13,395	2,036	3,496	3,777	280	142	9,540
2019	2,194	629,942	273	595,929	16,993	13,238	4,145	3,366	549	185	12,257
2020	2,267	681,245	250	634,181	15,343	9,321	4,409	3,617	466	172	28,82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20)。

2,556人次，2017年為2,585人次，2018年為2,603人次，2019年為2,194人次，至2020年達2,267人次（其他收容情形，見表2）。由數據分析可以得知，近年來遊民的人口大約在2,000人左右，人口的波動不大。縱使街友人口並未占臺灣大多數的人口，但也可能因為人口數較少，而導致權益被忽視、犧牲。

關於街友的人口學資料顯示，街友的男女比約為6：1，懸殊的人口比例也引起許多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進行關注。另外，針對2020年衛生福利部的調查顯示，目前對於街友的處遇可以分為三大方向，分別為「關懷服務」、「提供轉介或福利服務」以及「收容」；而關懷服務的類別中發現「餐食服務」為服務的最大宗，再來才是「提供物資」、「盥洗」、「訪視」。針對街友的需求，數據中也發現「醫療服務」是街友們很大的一塊需求，

其次才是「就業」、「福利」、「住屋」等需求。

### 三、疫情下街友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Finnigan提到街友除了不平等的暴露在COVID-19之外，失業、住處、損失、糧食問題等在疫情期間不成比例地增加 (Finnigan, 2021)。陳德倫 (2021) 也提及，在疫情下公共場所封閉、食物短缺、非典型工作機會流失，三級警戒嚴重衝擊社會底層，無家者在街頭無處躲避自保，蝸居族及弱勢家戶雖得一處擋風遮雨，不良的居住環境卻可能成為病毒溫床，收入每況愈下也難安身立命。可以知道疫情下街友的權益被剝奪，他們在結構上是弱勢群體，面臨著更高的身心健康問題，並承受重大的人身安全問題 (Davey-Rothwell et al., 2008; Robertson & Cousineau, 1986; Schanzer et al., 2007)。

從上述的文章及報導中，可以看見疫情下街友遭遇的不公義與壓迫，為了更具體的描述街友所遭受到的不公義，分別以「健康醫療」、「居住問題」、「工作機會」、「經濟收入」等四個層面進行說明。

### （一）健康醫療：高風險族群卻無法獲得疫苗

無家者面臨巨大的健康不公平情形（Omerov et al., 2020），包括「染疫的風險」、「原先的身體狀態」及「就醫的困境」。首先是染疫的風險。許多倡議者和專家都強調無家者對於冠狀病毒的高度脆弱性（Finnigan, 2021）。因為沒有辦法自主隔離，所以染疫的風險大大增加（Albon et al., 2020）。另外，陳德倫也提到無家者因長期營養不足、多重慢性病和居住環境不佳，健康狀態本就不如同年齡者，不僅免疫力較低，染病後的重症率和致死率也更高（陳德倫，2021）。最後，在就醫方面，李淑容（2015）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有四成受訪遊民表示身體狀況不佳，有近六成表示沒有健保卡可就醫，這個數字的背後凸顯的是遊民高比例的醫療需求。

疫苗施打的議題也是值得關注的，COVID-19疫情在臺灣的2021年5月失控，進入社區傳播階段。在此之前與之後，政府所公告的疫苗施打順序，皆引起許多社

會批評，認為臺灣現有疫苗施打優先順位，與歐美國家和WHO的倫理原則背道而馳（王品，2021）。WHO於2020年11月13日提出「疫苗供給有限時的施打優先路線圖指引」（roadmap for prioritizing），其中建議「工作具有染疫風險者」、「患有嚴重疾病或染疫風險高者」以及「無法有效保持防疫距離，具群聚風險者」為優先施打疫苗的三個族群。美國許多州的第一期接種對象也是針對是風險最高的第一線醫護／看護、消防救護／警察等人員，或是得病後可能產生重症或死亡各高風險人群，如長照、安養院、街友等（劉紹華，2021）。丹麥、羅馬尼亞以及英國也將街友列為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芒草心，2021）。反觀臺灣的防疫政策，6月21日最新公告的十類接種順位中，前五類及第七類都是職業別，其餘才是中高齡與染疫後可能轉重症或死亡的高風險疾病者，而街友甚至被排除在優先施打疫苗的十大優先順位中（後疫情關鍵字：整合筆記編輯部，2021）。由此可以看見臺灣的防疫政策宜增加對弱勢族群的關注。

### （二）居住問題：因應防疫政策而流離失所

當災難來臨時，人類的基本需求——一個安全睡覺的地方，總是十分匱乏（Ligety, 2021）。政府因應疫情所制定公共場所防疫相關規範，也將街友的住屋

問題浮上水面。社會採取了具集體規範意義的防疫政策如「待在家裡保平安」(Stay Home, Stay Safe)，使得不得不停留於公共空間的街友陷入窘境。「待在家裡」已成疫情期間定義公民是否合乎社群倫理的道德標準，而無法共通遵守這項規則的街友更容易被放大檢視、甚至惡意欺凌(李佳庭、賴彥甫，2021)。更嚴重的是，有些警政打著「為街友好」、「基於市容、防疫」的名號去驅逐、禁止街友流落街頭，影響其睡眠品質以及身心的健康，也是街友面臨的挑戰之一(Westbrook & Robinson, 2021)。沒有一個像家一樣的避風港，是無家者最直接面臨的生存困境，同時也是服務街友工作者手上最棘手的工作項目。沒有穩定居所，隨之衍伸的就是無法穩定就業、建立穩固社會連結等等的問題(Caton et al., 2007)。但無家者面臨的居住問題，不只是歸因於資本不足，更多是來自於結構的壓迫，以及複雜的個人因素(黎育如，2020)。

有些人建議，面對疫情流離失所的狀態下，應該提供收容所安置這些街友。然而，現今的收容所不足以容納這些街友，以臺北市為例，全市的收容所僅有170個床位卻要服務600多名街友。在高雄，露宿的街友人數高達360人，而現有的三民與鳳山街友中心加起來卻至多不超過120床；臺中列冊街友達300人，公營和民間單位可安置的床位數不到70床；臺南街友

人數達200人，可安置床位甚至不到25床(葉靜倫，2021)。由此可見安置床位僧多粥少的狀況。而就算街友真的得到了可以安置的資格，大多數的街友也不願意入住，部分的遊民因為覺得太過擁擠或是沒有隱私而不想住在收容所，另一部分的遊民則認為進到收容所的染疫風險更高(Finnigan, 2021)。像是美國華盛頓的收容所就曾經因為空間擁擠且睡眠空間無隔離、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無法提供足夠口罩、街友跨機構移動等問題而造成了三個收容所的感染事件(Tobolowsky et al., 2020)。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街友在疫情下遭遇到居住環境的困境與不平等。

### (三) 工作機會：工作流動率高，雇主沒有保障

疫情爆發後，為了因應 COVID-19 疫情於社區流行期間帶來的危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發布《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持續營運指引》，而勞動部也訂定《居家工作職業安全衛生參考指引》，鼓勵企業讓員工居家上班。然而，看似完善的防疫政策，卻也帶出街友工作機會及性質的不平等。遊民因為不符合社會對於一般人應該有工作的想像，加上被負面影響標籤化，實質地被排除在國家資源之外，僅能擔任臨時性、低收入的工作(李淑容，2015)。舉牌、派報、街賣、出陣頭……支撐無家

者生計的零工，在疫情之下的機會歸零，更不用說許多女性街友賴以維生的洗碗差事，在小吃店改為外帶後就毫無需求，只剩工地粗工和社會局提供的「以工代賑」還能維持。然而，人生百味負責人羅靖茹表示，儘管工地粗工還能做，街友們仍擔心跟著工頭到處跑會增加風險，討論後選擇減工躲疫情（陳德倫，2021）。

Monica Taylor (2021) 在 *Covid-19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ism: Why a social justice perspective matters* 一書中提到黑人族群因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SDH) 不佳，加上政府對於防疫的政策影響，例如訂定在家上班的政策。因為黑人族群所從事的工作，大多需要大量勞動力（如：各類收銀員、清潔工、公車司機或居家看護等），較無法在家上班。另外，他們多半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移動，更增加染疫風險。最後，從事這類工作，雇主恐怕沒有提供醫療保險，若自身罹患慢性病的比率又較高，一旦染疫，都將提高死亡風險。因此，在整體社會經濟條件不均等之前提下，當疫情爆發，黑人族群或黑人社區往往暴露於更高的危機中。雖然臺灣沒有黑人族群的議題，但同樣處類似處境的極度弱勢街友，仍然值得我們去關注與反思。

#### (四) 經濟收入：貧窮中的貧窮，卻得不到疫情補助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歐美主要

先進經濟體，造成全球需求大量減少，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由供給面轉向需求面，即使後來中國各地新冠疫情受到控制開始復工，在全球消費需求大幅減少，人流、物流、金流都受到限縮下，全球經濟開始受到嚴重的衝擊（張建一，2020）。企業受到經濟影響而關閉，也間接影響到失業率，因為沒有薪水支付房租，導致街友的人口數上升（Barbu et al., 2021）。然而，在Finnigan針對198名著在收容所無家者的自陳報告顯示，有1/3的街友覺得疫情下收入減少了，有1/4覺得少的非常多，只有5%有增加，而大多數人（62%）認為經濟上的收入沒有差別，有些受試者說：「我們的收入就是這麼低，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因為我們始終都沒有用擁有過」（Finnigan, 2021）。從這份報告中也可以看到「貧窮」似乎是一個在疫情前就已經根深蒂固影響著街友的巨大議題。

另一個經濟不平等的議題是關於疫情補助。因應疫情，勞動部、行政院、經濟部等各大政府部門都推出了許多紓困補助，甚至建立了紓困2.0的網頁。然而，街友卻因為工作性質多為打零工的方式，身分被認定為「非勞動力」無法申請失業救濟金，再加上零工的雇主通常未投勞保，他們也無法求助一般勞工的紓困補助（許詩愷，2020）。就算真的獲得了申請補助的身分，也可能因為居家辦公政策的關係，申請補助的公部門都被迫休息或是

使用線上的方式，不但延遲了補助款申請的進度，也讓申請疫情補助變得更加困難 (Barbu et al., 2021)。

#### 四、小結

從臺灣對於街友的正名演變的歷程看來，政府對於遊民的態度逐漸轉為開放、理解及涵容。雖然隨著不同的名稱想傳達出的概念有所差異，但仍是建立在平等、去汙名化的角度進行協調。而在數據分析及回顧中也得知街友的人口學，包括人口比例、性別比、政府介入程度等等。最後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我們也想要了解「在疫情下可使用哪些制度與政策來促進街友的福祉，達到社會正義」？

### 肆、社會正義觀點運用於街友議題

無家者的議題，可以看成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 (Rothe & Collins, 2016)。辨識社會結構問題需要透過深入了解由於年齡、階級、性別、種族、性、能力、宗教和地點等結構的交互作用，汙名化及社會排斥相互影響而產生對於無家者的多重且複雜的壓迫 (Watson & Cuervo, 2017)。面對這些壓迫，諮商師除了可以去理解結構的發生外，也可以透過賦權、建立自尊及個體化的政策，更加地去關心無家者非物質層面的需要。2003年以後，各國

對於無家者的社會正義研究越來越多，也訂定關於無家者的政策與方案，目標是為了消弭不平等，減少社會對弱勢的壓迫，並且有證據表明街友的人數有明顯下降 (Centeron & Policy, 2020)。

在COVID-19疫情流行之際，需要更多社會正義力量來去除弱勢族群所受之諸般壓迫，才能實現民主與均等，進而撫慰人心、發揚人性光輝，畢竟，我們都是休戚與共的群體 (鄭英傑, 2021)。以下針對上述所提及社會正義的三大元素「平等」、「資源的取得」以及「參與」來提供國內外針對疫情下街友處遇的方案說明。

#### 一、國外符合社會正義的策略：以美國的住房優先計畫為例

「住房優先理論」是英、美針對街友常使用的處遇策略。首先是美國住宅與都市發展局 (HUD) 制定的政策，允許機構向中央申請金費，依序解決遊民外展評估、收容所設置、短暫性住宅、永久性住宅的問題。提供住房的支持性服務可以幫助街友提升居住的穩定性，包括永久支持性的房子和安全的避難所 (Caton et al., 2007)。

以社會正義的四大要素來看，在平等的部分HUD透過社區的夥伴關係，幫助平衡資源的分配，使其「服務低收入美國人、振興貧困社區並組織皆有獲取平等

地位」，幫助完成其鼓勵住房擁有和社區發展的使命（Cronley, 2010）。而針對資源的獲取，過去街友在租屋的困境是因為藥酒癮、髒亂、積欠房租等偏見而被拒，然而住房優先理論提倡的是與部分的房東合作，並透過預先管理租金等方式，保障房東也使街友可以平等的獲取租屋的權益（Wilkins & Anderson, 2007）。最後，在參與的部分，在參與的部分，住房優先理論也提供一系列的介入政策，例如：環境衛生、藥酒癮戒治等項目，幫助街友適應生活。

## 二、國內符合社會正義的策略：以遊民安置輔導為例

臺灣遊民政策經歷了威權政府犯罪化對待無家者、民主化政府以社會福利處遇無家者的階段，到了近期越來越提倡社會正義的階段（黃克先，2021）。在面對街友的安置議題，過去大多以「殘補式」、「慈善、施捨」的方式去處理，因此也造成安置空間無妥善使用、街友不願接受集中管理、物資濫用等情形（黃克先，2021）。人權的興起以及疫情下所發現的不公平，也讓督促政府檢視無家者服務的背後邏輯，不應以他們可憐孤苦而以殘補或慈善為基礎，而使用「應得的公民權利」的框架來看待之。

2014年頒布《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所提倡的遊民安置輔導

策略即符合社會正義的展現。主要分為三階段，首先是緊急服務，重點在主動出擊外展，讓資源平等地進入現場，以維護遊民生存權利。其次是過渡服務，重點在提供耗時更長的安置和處遇，以過渡至下一個階段。最後是穩定服務，重點在穩定就業、復歸社區，包括提供永久住處、長期諮商等，提供更長遠、穩定的服務。

上述計畫皆致力於達到街友獲取資源的平等，將街友的參與納入長期輔導與安置的策略，然而對於資源獲取的公開性與平等性仍可再多加著墨，尤其是因應疫情下對於安置駐所的需求大增，如何平等的幫助街友們獲取最佳的利益，也是值得我們去反思與研究的一環。

## 三、社會正義中的參與要素：機構與心理健康的賦能

賦能的介入創造了發展的機會，並且被定義為「以群體為基礎的參與性發展過程，通過這樣的過程，被邊緣化或受壓迫的群體可以對生活和環境有更好的控制，獲得寶貴的資源和基本權利，以實現重要的生活目標，減少社會邊緣化」（Maton, 2008）。賦能的概念強調個人抉擇、尋找聲音、強調優勢而非缺失，以及超越壓迫（Cattaneo & Chapman, 2010; 傅如馨，2020）。以下針對「社區機構的賦能」以及「心理健康的賦能」進行說明：

### (一) 社區機構的賦能

過去許多機構的服務模式以提供者-接受者為導向，並持續將服務者的角色專業化和無家可歸者醫療化 (Sahlin, 2005; Scullion et al., 2015)。然而，這樣的服務方式並沒有達到顯著的成效，Fitzsimons 與 Fuller (2002) 呼籲社區諮商師可以針對環境的賦能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而 Maton (2008) 訂定了賦予社區組織權力的六個特徵：核心活動、有關係環境、群體意識體系、機會角色結構、領導力以及環境維護和改變。

### (二) 心理健康的賦能

由社會環境的賦能去做延伸與擴展，Fitzsimons 與 Fuller (2002) 回顧文獻整理將心理健康環境的賦能分類為「能力的建立」、「合作」、「彈性、個別化與優勢觀點」、「促進及發展支持」。

#### 1. 能力的賦權

有助於服務用戶獲得社會、政治、教育或經濟資源，或培養他們有效調動這些資源的技能 (Swift & Levin, 1987)。

#### 2. 合作上的賦權

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運行互惠和公平的過程，並促進民主參與，以便服務街友確定自己的目標 (Prilleltensky & Laurendeau, 1994)。

### 3. 彈性、個別化與優勢觀點的賦權

提供的支持適應服務用戶不斷變化的需求。個別化的介入措施是為了適應服務用戶的個人需求和偏好量身定制的。而基於優勢的賦能側重於提高服務使用者的現有功能，而不是解決他們的缺陷 (Lord & Hutchison, 1993)。

### 4. 促進及發展支持的賦權

提供發展支持的賦能強調自助、互惠互利、體驗式學習、社會支持和個人對服務的掌握 (Solomon, 2004)。

## 伍、結語

COVID-19 傳染病的肆虐，照理來說，應是「無差別攻擊」，然諷刺之處在於，人為因素的涉入導致某些特定弱勢族群所受到的衝擊，卻比其他族群來得嚴重 (鄭英傑, 2021)。街友議題一直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與法規時容易忽略的族群，然而，除了沒有地方安穩的睡覺，他們其實跟我們沒有不同，一樣需要歸屬，一樣需要受尊重，也一樣害怕著疫情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然而，令人動容的是，儘管口罩隔開了人與人的社交距離，卻沒有阻隔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愛。在疫情爆發不久，許多非營利組織主動捲起袖子，搶在政府發布相關救援措施前，先提供了無家者

第一時間的幫助。從一開始人生百味上街發送物資，先解決生理層面的需要；芒草心組織提供街友暫時性的免費住宿、重修舊好咖啡廳提供街友洗澡的需求；甚至夢想城鄉及其他關注於無家者的組織，也發起了「脆弱畫室」、「石頭湯」、「寫寫字工作坊」等活動去照顧到無家者的心靈需求；最後，透過「人生萬事屋」、「街遊」等專案的發想，媒合其他團隊與資源，幫助街友找到穩定、有價值的工作，重新賦能給予他們再站起來的勇氣與希望。反觀專業的助人工作者可以參考這些服務模式，或透過相互學習、共同合作，甚至參與其中等方式，讓街友議題獲得更有效能的幫助。

這場疫情雖然看似帶來許多不便以及未知的恐懼，但他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慢下來好好去看見、去傾聽弱勢族群的聲音。透過社會正義的四個要素

「平等」、「資源的取得」、「參與」以及最後希望達到的「和諧」作為街友處遇的原則，能讓疫情下街友的議題更加平等的被看待。致力於為街友權益發聲的「人生百味」組織也提到：「同島一命也不只是情感訴求，而是每個人如何透過穩定的新生活方式，阻絕傳播鏈，並增強支持網絡。畢竟，我們想對抗的是病毒，並非是人。」。透過這場疫情也增加了研究者對於被邊緣化族群的關注與研究，提供政府單位一個好的契機去改變過去制定的政策以及處理無家可歸者的方式（Barbu et al., 2021; Finnigan, 2021）。

（本文作者：顏睦蓉為國立暨南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發展學系碩士生；趙祥和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COVID-19、街友、社會正義

## 📖 參考文獻

- 方孝鼎（2001）。《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工為例》（博士論文，東海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k333ff>
- 李玟萱（2016）。《無家者：從未想過我有這麼一天》（第三版）。游擊。
- 李淑容（2015）。〈社會排除下的遊民：處境與對策〉。《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9，149-171。
- 芒草心（2021，6月2日）。〈無家者優先施打疫苗是困難但必要的決定〉。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https://www.homelesstaiwan.org/post/20210621statement>
- 芒草心（2021，6月30日）。〈無家者等居住弱勢者群聚感染風險仍在，市政府應盡速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https://www.homelesstaiwan.org/post/20210630>

statement

- 後疫情關鍵字：整合筆記（2021，6月14日）。〈疫苗施打優先順位如何決定？WHO給的指引與考量〉。方格子。<https://vocus.cc/article/60c6ef77fd89780001085720>
- 後疫情關鍵字：整合筆記編輯部（2021，8月11日）。〈放下偏見，看見街友的無奈與疫苗優先原則〉。記疫COVID 19。<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12285>
- 夏傳位（2014）。〈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27，141-166。
- 徐敏雄（2018）。〈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力課程實踐歷程的個案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4（2），1-33。
- 張健一（2020）。〈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因應〉。《兩岸經貿》，342，8-11。  
<https://www.sef.org.tw/files/6253/36B0C31F-9657-477E-9FE0-65370C1B27A7.pdf>
- 莊瑞君（2021）。〈校園同志諮商輔導 FOSTER 專業知能模式之建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0，73-108。
- 許詩愷（2020，4月23日）。〈比抗疫更艱難的街友求生記〉。陽光行動。<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120965/4512807>
- 陳德倫（2021，7月8日）。〈失業流離的疫情長浪來襲，如何拉住無家者和弱勢居住族群？〉。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homeless-and-disadvantaged-tenants>
- 陳燕禎（2011）。〈遊民問題與管理之探討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34，441-457。
- 傅如馨（2020）。〈從新住民婦女的婚姻暴力談社會正義諮商〉。《應用心理研究》，72，131-176。
- 黃克先（2021）。〈台灣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運作及效果：從基層官僚治理取徑切入〉。《台灣社會學》，41，51-94。
- 葉靜倫（2021，12月3日）。〈所謂遊民，不過是一群無家可歸的市民：「就地安身」是失敗的安置，還是成功的輔導〉。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9661/page2>
- 葉寶玲（2016）。〈多元文化諮商的核心：社會正義諮商〉。《輔導季刊》，52（2），13-21。
- 劉紹華（2021，6月14日）。〈當我們討論「誰先打疫苗」時，必須先正視結構性暴力〉。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614-taiwan-vaccine-shaohualiu>
- 鄭英傑（2021）。〈這場疫情教我們的事：評介《新冠肺炎與種族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何社會正義觀點如此重要》〉。《教育研究集刊》，67（3），137-146。<https://doi.org/10.3966/102887082021096703004>
- 黎育如（2020）。《支撐無家：街頭上的社會工作者》（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9sy5s5>

- Albon, D., Soper, M., & Haro, A. (2020).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Chest*, *158*(2), 477-478.
- Barbu, S., Barranco, S. P., & Silk, R. (2021).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homeless service providers and homeless people: The migrant perspective. *Cityscape*, *23*(2), 361-380. <https://www-jstor-org.utorpa.lib.ncnu.edu.tw/stable/27039967>
- Bradley-Engen, M. S. (2012). Stigma and the deviant identity.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deviant behavior* (pp. 213-217). Routledge.
- Caton, C. L., Wilkins, C., & Anderson, J. (2007). People who experience long-term homeless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entions. National symposium on homelessness research.
- Cattaneo, L. B., & Chapman, A. R. (2010).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a model for use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5*(7), 646-659. <https://doi.org/10.1037/a0018854>
- Centeron, B., & Policy, P. (2020). *People experiencing or at risk of homelessness should be a priority in state COVID-19 responses*. <http://www.jstor.org.utorpa.lib.ncnu.edu.tw/stable/resrep24761>
- Crethar, H. C., & Winterowd, C. L. (2012). Values and social justice in counseling. *Counseling and Values*, *57*(1), 3-9.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2012.00001.x>
- Crethar, H. C., Rivera, E. T., & Nash, S. (2008). In search of common threads: Linking multicultural, feminist,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paradigm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6*(3), 269-278.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8.2008.tb00509.x>
- Cronley, C. (2010). Unravel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melessnes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0*(2), 319-333. <https://doi.org/10.1080/10911350903269955>
- Finnigan, R. (2021). Self-reported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or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 Sacramento, California.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Homelessness*, *31*, 1-9. <https://doi.org/10.1080/10530789.2021.1879618>
- Goodman, L. A. (2013). *Cultural competency for social justice by Diane J. Goodman, Ed.D.* <https://acpacsje.wordpress.com/2013/02/05/cultural-competency-for-social-justice-by-diane-j-goodman-ed-d/>
- Goodman, L. A., Liang, B., Helms, J. E., Latta, R. E., Sparks, E., & Weintraub, S. R. (2004). Training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as social justice agents feminist and multicultural principles in actio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2*(6), 793-836.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04268802>
- Harrison, D. (2020). *An exploration of male offenders experiences of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l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Company* [UoM administered thesis]. [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en/theses/an-exploration-of-male-offenders-experiences-of-access-to-mental-health-services-education-and-training-while-under-the-management-of-the-community-rehabilitation-company\(0b1b7424-b75c-4be0-a934-](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en/theses/an-exploration-of-male-offenders-experiences-of-access-to-mental-health-services-education-and-training-while-under-the-management-of-the-community-rehabilitation-company(0b1b7424-b75c-4be0-a934-)

- bcafce446dd7).html
- Larmore, C. (1990). Political liberalism. *Political theory*, 18(3), 339-360.
- Ligety, C. (2021). A fresh look at emergency and rapid shelter solutions: Key takeaways from the rapid shelter innovation showcase. *Cityscape*, 23(2), 459-47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039974>
- Lord, J., & Hutchison, P. (1993). The process of empower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12(1), 5-12. <https://doi.org/10.7870/cjcmh-1993-0001>
- Maton, K. I. (2008). Empowering community settings: Agent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betterment, and positive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1(1-2), 4-21. <https://doi.org/10.1007/s10464-007-9148-6>
- Omerov, P., Craftman, Å. G., Mattsson, E., & Klarare, A. (2020). Homeless persons' experiences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 systematic integrative review.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8(1), 1-11. <https://doi.org/10.1111/hsc.12857>
- Peattie, P. (2021). Reframing narratives of homeless individuals: The roles of basic dignity and safeguarding in reconstructing perception. *Journal of Poverty*, 26(3), 214-232. <https://doi.org/10.1080/10875549.2021.1910101>
- Ratts, M. J. (2009).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fifth force among counseling paradigms.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8(2), 160-172. <https://doi.org/10.1002/j.2161-1939.2009.tb00076.x>
- Ratts, M. J., DeKruyf, L., & Chen-Hayes, S. F. (2007). The ACA advocacy competencies: A social justice advocacy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11(2), 90-97. <https://doi.org/10.1177/2156759X0701100203>
- Ratts, M. J., Singh, A. A., Nassar-McMillan, S., Butler, S. K., & McCullough, J. R. (2016). Multicultural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Guidelines for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4(1), 28-48. <https://doi.org/10.1002/jmcd.12035>
- Rothe, D. L., & Collins, V. E. (2016). The integrated spectacle: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ly dead. *Social Justice*, 43(2), 1-2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380300>
- Rubenstein, L., & Decamp, M. (2020). Revisiting restrictions of rights after COVID-19.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22(2), 321-324.
- Sahlin, I. (2005). The staircase of transition: Survival through failure.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8(2), 115-136. <https://doi.org/10.1080/13511610500096400>
- Scullion, L., Somerville, P., Brown, P., & Morris, G. (2015). Changing homelessness services: Revanchism,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resistance.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3(4), 419-427.

<https://doi.org/10.1111/hsc.12159>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Sage.
- Solomon, P. (2004). Peer support/peer provided services underlying processes, benefits, and critical ingredient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27(4), 392-401. <https://doi.org/10.2975/27.2004.392.401>
- Swift, C., & Levin, G. (1987). Empowerment: An emerging mental health technology.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8(1), 71-94. <https://doi.org/10.1007/BF01695019>
- Tobolowsky, F. A., Gonzales, E., Self, J. L., Rao, C. Y., Keating, R., Marx, G. E., McMichael, T. M., Lukoff, M. D., Duchin, J. S., & Huster, K. (2020). COVID-19 outbreak among three affiliated homeless service sites- King County, Washington, 202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69(17), 523-526. <https://doi.org/10.15585/mmwr.mm6917e2>
- Watson, J., & Cuervo, H. (2017). Youth homelessness: A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2), 461-475. <https://doi.org/10.1177/1440783317705204>
- Westbrook, M., & Robinson, T. (2021). Unhealthy by design: Health & safety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homelessness.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Homelessness*, 30(2), 107-115. <https://doi.org/10.1080/10530789.2020.1763573>
- Wilkins, C. M., & Anderson, J. M. (2007). *People who experience long-term homelessness: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entions*. Toward understanding homelessness: The 2007 national symposium on homelessness research.